



第十二卷

新发展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主 编/陈光金 张 翼
副主编/黄丽娜 何昇轩

海外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十二卷

新发展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主 编/陈光金 张 翼
副主编/黄丽娜 何昇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发展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 陈光金, 张翼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9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ISBN 978-7-5201-2863-6

I. ①新… II. ①陈… ②张… III. ①社会管理-现
代化管理-中国-文集 IV. ①D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9188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 ·

新发展理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主 编 / 陈光金 张 翼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谢蕊芬

责任编辑 / 杨 阳 张真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 (010) 59367159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4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863-6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编委会

主 任：李培林

副主任：陈光金 张 翼 穆林霞

委 员：鲍 江 刁鹏飞 何 蓉 景天魁

李春玲 王春光 王俊秀 王晓毅

吴小英 夏传玲 赵克斌

秘 书：黄丽娜 冯希莹

总 序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1984年5月21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成。198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施博士后制度。

我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就是1988年在北京大学设立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则成立于1999年。1999年至今，10多年过去了，已经招收了近百名博士后，他们多数都已经出站，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实践证明，中国博士后制度对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才流动，创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此后，举办这个论坛成为一项制度，坚持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先后在北京、武汉、厦门、沈阳、重庆等地成功举办了十一届。与我国其他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论坛相比，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参加人员的广泛性。参加论坛的，既不限于在站的博士后，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参加论坛的热情也很高；也不限于本站的博士后，其他高校的社会学博士后也有不少人参加；还不限于社会学的博士后，其他学科的博士后往往也来参加；而且不限于博士后，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也满怀兴趣地参加。这样就使这个论坛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论坛会上会下交流方式多样。这个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为依托，联谊会还设立了地区分会，他们积极参与论坛的组织工作，除了邀请著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组织专题分论坛之外，还组织会下

的讨论会和会后的社会调查。很多博士后反映，通过这个论坛活动，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不站站内站外，不分学科专业背景，充分深入地交流，并能发现很多平时自己本学科容易忽略的问题，扩大了自己的学科知识面，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得到不同学科视角的诠释和理解。

第三，学术成果丰硕。论坛参加者以文入选，要提交合乎学术规范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而且论文的题目要贴近论坛的主题。而论坛的主题，往往是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每年论坛之后，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涉及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博士后学术论文，我们选择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就形成现在这个社会学博士后论文集的系列。我们希望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个论文集系列，能够记载我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记载社会学博士后的学术足迹。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新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探索中，社会学承担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和研究重任。但愿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的这个论文集系列，也能为担当这一学术使命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部分 城镇化与农村发展

-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 史 斌 / 3
- 农村流动青年与未流动青年的就业理性
- 基于 2013 年和 2015 年 CSS 数据的分析 张立龙 王 炜 / 18
- 中国城镇化“内生式”发展的可能性及建构路径
- 以苏南城镇化为例 范虹珏 胡 浩 付 顺 / 34
- 发展主义及其超越
- 对现代发展观的一项社会学审视 陈立周 / 52

第二部分 贫困救助与社会政策

- 疾病照料负担对困难家庭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 基于全国城乡困难家庭入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戈艳霞 / 65
- 社区场域内居委会与民办社工机构的定位及关系分析 周 艳 / 84
-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精准救助：理论、实践及政策指向 胡思洋 / 97
- 省域光荣院建设的管理与服务
- 创新 赵春盛 李艳华 饶 维 李荣新 / 116

第三部分 社区治理

回归社会

- 现代贫民住区治理的行动与模式 ... 孟翔飞 刘玉梅 王 雪 / 133

流动与边界

——流动人口融合认同的建构 董敬畏 / 150

民众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谭旭运 豆雪姣 / 160

第四部分 组织、阶层与文化

跨文化视阈下宗教融合趋势研究

——以禅宗为例 闫 雨 / 181

单位研究的产权视角：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 王庆明 / 193

Tables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207

第一部分 城镇化与农村发展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

史 斌

摘 要：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范式是理解流动农民工城市适应和融合的重要研究视角。本文运用实证调查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中的社会网络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网络规模、异质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是考察流动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测量指标。其中，网络规模和异质性关系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排斥预期；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都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并且情感性关系的作用更明显。

关键词：社会网络 社会距离 城市居民 新生代农民工

一 引言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帕森斯以来传统的地位结构观将人们的社会行为解释为受社会结构影响制约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将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tie）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个人、组织和社会及其行为的影响。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对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就始终沿着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行发展。整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心的是群

体内部关系,如紧密性、中距性、中心性等;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关心的是个体及其行为如何受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如强关系力量假设和弱关系力量假设、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等。本文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来论述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中的影响和作用。

任何社会的个体成员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通过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从而确保个人的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学者们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对城市移民的研究探讨逐渐增多。网络分析被看成一种描述城市社会关系模式的有效手段。在移民的社会行动和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上,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日渐突出。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是“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的混合体。工具性关系主要是指一些物质性的帮助关系,如购买物资、借钱、寻找工作和找对象等;情感性关系主要是指一些情感性的关系,如倾诉心中苦闷、一起娱乐等。在中国的城市人口流动过程中,大量“陌生力量”从乡村和欠发达地区融入城市,既改变了流出地和流入地居民的利益关系,也改变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流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不仅发生经济交往,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发生着广泛的社会互动,这种交往的结果以个体自我中心社会网络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说,流动行为改变了城市本地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构成,社会关系网络通过社会生活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与城市生活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焦点。根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的研究,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出生于农村,却没有务农的经验和经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已经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使他们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与城市居民在各方面的差异又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本文试图以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中的社会网络因素影响作一个分析。

二 研究回顾

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与程度”，是理解社群融合和社群隔离的重要指标，目前学术界所使用的“社会距离”概念主要来自法国思想家塔德。塔德在《模仿的规律》一书中首创了这一概念，并将其用于表征阶级差异。塔德认为社会距离是阶级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反映（塔德，2007）。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2007：384）认为，社会距离是一种描述自我与外在客体内容间的特定关系。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继承并发扬了齐美尔有关社会距离的思想，将其运用到对于种族和族群关系的理解上，使得社会距离成为一个极具丰富内涵的概念。帕克认为社会距离能够“使得我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和隔离”（Park，1950：257）。

博格达斯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距离实证化。他设计了一套测量技术，包括7项内容：①愿意与其通婚结成近亲关系；②愿意让其成为俱乐部成员；③愿意让其成为邻居；④愿意让其成为我的同事；⑤愿意让其成为美国的公民；⑥只愿让其成为美国的游客；⑦不愿让其与美国发生任何接触（Bogardus，1925）。Lee等人从小族群的感受角度出发，设计了另一套反转的社会距离量表，包括5项内容：①他们愿意您做他们的亲戚、和其通婚吗？②他们愿意您做他们的亲密朋友吗？③他们愿意您住在他们隔壁吗？④他们是否愿意您居住在附近？⑤他们是否愿意您成为该国公民？（Lee et al.，1996）

导致社会距离产生的原因很多，生物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差异、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都是影响社会距离的重要因素。其中，社会网络是影响社会距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社会网络和社会行为分析范式，而不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范式，是近年来流动农民工研究又一重要而有效的研究范式。李培林（1996）认为，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离土又离乡”的流动过程中，其信息来源、找到工作的方式、进城工作的行为方式以及在城市中的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于其以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流动农民工在流动中社会生活场发生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边界；流动农民工在社会位置的变动中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并非一种传统的农民习惯，而是一定结构安排下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化结构的安排。李汉林、王琦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观察分析，提出了“虚

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概念。他们认为,在城里的农民工形成的只是一个非区域性的虚拟社区,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式。所谓虚拟社区,就是指在一个城市内,农民工按照差序格局和工具理性构造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非制度化信任是构造这种虚拟社区的基础,而关系强度则是这种社区组织和构造的重要方式(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15~39)。渠敬东认为,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两个基本阶段: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为主的“生存阶段”和以强关系为主、利用了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且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在“生存阶段”,围绕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村外来人口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村外来人口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蕴;在“发展阶段”,农村外来人口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性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村外来人口本身,以及他们的社会网络乃至社区,都是社会网络及其运动的效果(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44~68)。曹子玮通过对三个理论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的验证,发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由农民向工人转变)、资源获取方式(由依赖土地向不依赖土地转变)、空间位置(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依然没变。曹子玮进一步解释认为,农民工依赖初级关系是一种理性选择,因为这种基础节约了交易成本,增大了职业获得的成功率,能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资源。同时,初级关系的加强又受到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城乡两种制度体系有相互排斥的倾向,从而导致农民工的关系结构和职业获得依然受到初级关系的制约(转引自柯兰君、李汉林,2001:71~91)。林善浪等(2009)通过对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外出务工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是否能在务工地点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将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在异地的社会依托,是农民工“相亲相助”的社会力量,在提供援助、表达情感、承担社会风险和抗御外来压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而又超越传统资源的优势。

三 研究设计

(一) 结构测量指标

从研究背景分析中，可以认识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研究社会距离，实际上是作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作为客体的城市居民之间的一个双向互动过程。新生代农民工视角下的社会距离可以分解成两个层面：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融入意愿是心理上主动渴望和向往融入城市居民群体的程度；排斥预期是当与城市居民发生社会交往时预期感受的排斥程度。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研究社会距离的构成，一方面符合农民工社会距离的基本分析框架（郭星华、储卉娟，2004），另一方面也符合农民工自我归类和社会融合的主要过程（高海燕，2005）。

与研究相关的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具体指标的操作化测量如下。

（1）背景资料：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留本地年限等。

（2）社会文化资料：包括被访者的语言能力、对本地风俗习惯的掌握和使用情况等。

（3）社会距离资料：借鉴社会距离量表和反转社会距离量表，并根据国内实际情况进行修订，设计了“融入意愿量表”和“排斥预期量表”（见表1），每套量表各包括6个问题。被访者从“5——非常愿意、4——比较愿意、3——一般、2——不愿意、1——很不愿意”中进行选择。这6个项目被认为代表社会距离程度逐渐增强，这样就形成了格特曼量表。在“融入意愿量表”中，将分值累加得到融入意愿值；在“排斥预期量表”中，以30减去分值累加得到排斥预期值。

表1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量表”和“排斥预期量表”

融入意愿量表	排斥预期量表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聊天？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跟你聊天？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一起工作？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工作？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成为邻居？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和你成为邻居？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成为亲密朋友？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和你成为亲密朋友？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一起参与社区管理？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参与社区管理？
你是否愿意和本地人通婚或结成亲戚？	你觉得本地人是否愿意和你通婚或结成亲戚？

（二）资料来源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是浙江省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市域总面积 9365 平方公里，宁波城区下辖 6 个区、64 个街道办事处（乡、镇）和 235 个居民（村民）委员会。截至 2016 年底，全市户籍人口为 591 万人，其中市区为 284.2 万人，登记在册流动人口为 460 万人左右。

调查样本的抽取采用选择典型地点制作抽样框进行多阶概率比抽样方法。具体抽样过程包括四个步骤。第一，选择典型区域。根据外来人口集中和居住情况，选择城市中心区（江东区）、城市郊区（鄞州区）、城郊接合部（北仑区）外来人口居住相对集中的三个区域，作为本次问卷调查的抽样选择地。第二，制作抽样框。在所选择的典型区域内，根据外来人口暂住登记名单，清点该区域内所有出生于 1980 年以后，在宁波居住时间超过 1 年的外来人口的总数，明确每一个居住单元的具体位置和合格人数，然后将这些信息制成一个抽样框。第三，一阶抽样产生入户名单。利用该抽样框，根据随机数表产生的随机数字对应每一个统计的居住单元，产生需要调查统计的居住单元的人数和地点。第四，二阶抽样确定受访者。根据抽样名单入户选择调查对象，在入户选择调查对象的过程中凡是遇到一户多人符合入选条件的情况，就根据随机原则，选择出生日期靠近抽样日期（4 月 1 日）的个体作为本次抽样所选择的对象。根据上述方法，最后共发放问卷 300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有效回收率为 73.33%。

（三）研究假设

本文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指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s）。在以前有关自我中心网络的研究中，研究者虽然涉及不同的研究主题，但是在描述网络特征时使用了大致相同的指标。这些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的强度）、网络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差异性（diversity）、关系的内容、关系的多重性（multiplexity）等（张文宏，2006：122~123）。

张海辉（2004）的研究认为，社会距离的大小与网络规模和网络类型有关，本地人和外地人通过相互建构对方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缩小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关系网络规模（size of social network）指的是构成一个社会网的成员的数目，代表着与其发生深入交往的人数的多少，是测量一个人社会资本拥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很多研究都已经证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他/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可能在社

会行动中占据优势地位 (Lin, 1982, 2001, 转引自张文宏, 2006: 123)。因此, 可以假设,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与他发生交往和联系的人数越多, 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其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也越小。

社会距离除了和网络规模的大小有关, 还和网络中包含的成员的异质性有关。异质性是衡量某种社会网络的成员之间 (不包括自我) 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相同或相异的程度。每个人的社会网络都有其特有的异质性或多元性。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城市居民之间社会距离的差异, 因此, 我们将异质性指标简化处理为身份异质性 (本地居民/流动农民工) 这一单一指标, 即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在户籍身份属性方面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概率。通常而言, 身份角色关系与网络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高度相关 (刘传江、周玲, 2004)。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包含的城市本地居民人数越多, 其与城市本地居民发生互动的程度也越频繁, 交往越密切, 网络为其带来的社会资源就越多, 其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就越小。

对于网络性质的判断, 最常见的划分标准是将网络划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黄光国 (1988: 1~55) 认为, 工具性关系是为了达到功利性目的而建立的; 情感性关系则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关爱、温情、安全和归属等方面的需要。林南 (Lin, 1999: 28~51) 在建构其社会资源理论模型时, 采取了二维的标准, 认为工具性网络的性质是旨在获得不为行动者本身所拥有的资源, 而情感性网络则旨在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杨中芳 (2001: 315~370) 提出人际关系中包含了既定性成分和交往性成分, 既定性成分是原有关系基础上的义务性成分, 而交往性成分则包括了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个体可以通过交往决定彼此的关系深入或是退出。借鉴前人对网络性质划分的不同标准,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区分为工具性和情感性两种。根据差序格局理论, 中国人一般不会与自己“圈子”以外的人发生更多的交往, 投入更多的情感。因此, 工具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都有助于缩小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因此, 综合考虑,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网络规模假设: 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

具体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 1.1 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意愿越大。